

引 言

文化 是 20 世纪人类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世纪之交 文化更是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家、思想家和各门学科学者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这一现象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深入地思考。

本世纪初叶 在伦敦郊外寂静的古战场墓地上 人们常见到一位修长灰发、目光深邃的学者在徘徊、思索和搜寻着。他就是当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此刻 他正在凭用第六感官倾听古代马其顿战马的铁蹄声、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论辩声、古代中国修建万里长城的号角声、中世纪巴黎圣母院教堂里的钟鸣声……；正在捕捉研究人类数千年历史的灵感 绘制思维空间中的历史画面 跟踪人类 26 种文明发展的足迹。他说：“这里如同科学界的电台一样 可以收听到世界边缘所发出的心理电波 它们来自遥远以前的时代。”^①

《文明：充满生死搏斗的神秘剧——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第 1 页。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出生于西方文明正处于巅峰状态、史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当青年时代侨居希腊钻研西方古代史时,面对着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汤因比就经常徜徉于古希腊文化废墟的残垣断壁间,在夕阳西下、大地沉寂的时刻,感受来自遥远年代人类的呻吟,捕捉探究人类历史的灵感。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结束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与和平,终于触发了汤因比“文化形态史观”的形成。他认为,首先,文明形态是人类历史的真正载体。因此,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或能够说明问题的最小范围就是文明社会。其中作为精神活动之集中体现的文化乃是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或核心。其次,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有史以来出现的诸种文明社会并无孰优孰劣、孰高孰低之分,而是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同等重要。所以,历史哲学的研究理应放弃狭隘的自我文化中心论和偏颇的一元文化观,转向一种整体性的、深层次的文明形态比较研究。

基于这种认识,从1934年到1961年,经过近30年的呕心沥血,汤因比终于建构起一部12卷本、洋洋500万言的历史哲学专著——《历史研究》。这部鸿篇巨著摆脱了西方传统史学研究中以西方社会为中心,以单一的民族国家为单位,偏重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角度,或者仅仅满足于对具体历史事件和片断的描述、拼接,容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与弊端,通过跟踪探寻人类有史以来26种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以至解体的足迹,对人类社会六

千年文明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揭示了人类文明在挑战——回应的矛盾冲突中不断进步的发展规律。这部巨著的推出，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被誉为“20世纪精神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①“给了我们比20世纪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所作的最有意义的贡献”。^②因为这部著作，汤因比成为当代历史哲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在西方学坛上被列为与爱因斯坦、史怀哲、罗素等齐名的智者和通哲。

如果说汤因比是找到了“文化”这把钥匙，打开了人类文明历史尘封已久的一扇大门，向世人展示出人类六千年文明史的发展脉络的话，那么，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则是把“文化”当作探测人类未来的望远镜，从一个角度去观察、分析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和复杂图景。

塞缪尔·亨廷顿，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现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1993年夏，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是一种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界定的文化实体。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将不再是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

见《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三联书店，1961年，第272页。

见《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374页。

对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21 世纪的世界格局将不再是西方文明独步天下，而是由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 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等七八个主要文明共同构成的多极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军事冲突的中心地带，21 世纪主宰全球的将是各大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如果说还会有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将是一场异质文明之间的战争。

该文的发表，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际学术界迅速引起了一场激烈而漫长的论争。三年间 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论争文章超过了该杂志自 40 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在我国 近几年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发表的评析文章已不下百篇。为回应这场论争，1996 年亨廷顿又撰写了一部 30 多万字的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更加系统、全面地阐述其思想观点 也对原文只是强调异质文明之间冲突的偏颇做了一些修正。该书出版仅一年多，就被翻译成 22 种不同的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传阅。正如最先发表该文的《外交》杂志的编辑们所指出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继本世纪 40 年代布坎南提出的“遏止”思想之后另一最富有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它几乎刺激了人类所有文明的神经。对此，不同国家、民族和文明的人们褒贬不一 见仁见智。

十分有趣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汤因比和亨廷顿这两位称雄本世纪、相隔好几个年代的学坛巨擘，在分析、展望

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图景时，都情有独钟、不约而同地把视线投向了东方，投向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

汤因比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前景有过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1950年，他曾断言：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文明都已处于僵化和解体境地，而“西方文明是它这种社会中没有显示出不可置辩的解体征兆的惟一现存代表”。“一个现已遍及全世界的西方社会把全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①然而，到了晚年，汤因比的这一观点发生了根本的转变。1974年，他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发表了题为《展望二十一世纪》的著名对话，在分析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走向时，又对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把世界的和平、繁荣的希望寄托在中华文明的复兴上。他认为，在过去几百年间，由于西方诸民族将其活动范围扩展到了全球，结果出现了技术上的统一。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其主要任务将是实现政治与精神方面的大同。在这一阶段西方将把其主导权交给东亚。他指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一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②

汤因比：《历史研究》（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373～374 页。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年版，第 295 页。

亨廷顿把儒教文明（亦即中华文明）同伊斯兰文明一道，列为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挑战的两种文明。他认为：“两千年来，中国曾一直是东亚的杰出大国。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他们想恢复这个历史地位，结束屈辱与屈从于西方和日本的漫长世纪，这个世纪是以 1842 年英国强加给中国的南京条约为开端的。^①”为此，亨廷顿还虚构了一场发生在 21 世纪、以“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与另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与该文明成员国——越南”之间的争端”为起因的全球战争。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和“中华文明优越论”，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中华文明威胁论”，都是我们所不同意的。尽管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某些具体的论点、论据以及分析研究问题的方式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吸收，但从根本上讲，他们两人的思想观点都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是站在西方角度和立场上的一种主观臆测。因为本课题的旨趣所限，笔者无意在此对其进行条分缕析的全面评判，只想借此引出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几点认识：

第一，文化是人类的一面镜子，既可以帮助我们回顾了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88 年版 第 255 页。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88 年版 第 366 页。

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过去，也可以用来分析展望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在和未来。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伴随，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人类文化从无到有、从单薄到厚实、从落后到先进的历史，就是不同类型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不断更新发展的历史。因此，认识了解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也就有助于人们了解、把握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过程和内在规律。

第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对立统一中发展变化的，文化或文明也不例外。生活在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和经济政治等社会环境迥然相异的人们，由于面对的现实世界不同，实践活动的内容和方式不同，因而所创造的文化或文明也就有所不同。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民族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有差异就会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冲突。历史上，相邻或相近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屡见不鲜。现实中，交通和通讯的空前便利使全球一村；人类日益频繁的交往进一步强化了不同文明人们的文化寻根意识；冷战后两极制衡机制的散落使世界各国、各地区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差别更加凸现。面临世纪之交，文化作为国际政治“软权力”的作用仍在不断抬升，对文化或文明的关注已经越出了抽象的学术领域，而发展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越出了局部地区的范围 成为 21 世纪一个全球性的重大战略议题。

第三,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不同文化、文明之间既有独特性、差异性,也有相通性、统一性。从根本上讲,既然都是人类的文明,是和野蛮相对的文明,它们之间就会有反映人类共性要求和人类文明进步共同方向的内容,必然有相同或相通之处。事实上,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融通比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长远性。当今世界,不同文化背景和文明状况的人们日益频繁的交往,固然会产生摩擦和碰撞,但更重要的是促进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空前广泛深入的共处和交流,使以前彼此隔绝的人们发现人类文明的共通性和交融性。只要持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则文化和文明的交融将会在矛盾冲突中越来越广泛深入地展开,21世纪将会成为人类文化和文明大碰撞,同时又是大交融的世纪。

第四,毫无疑问,文化因素能够深刻地影响国际关系,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预测未来,都应当把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去。但是,我们要随时记住,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是分不开的,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也是不能分开的;是社会的经济关系、物质关系决定人们的观念文化,而不是相反,但观念文化的形成发展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具有反作用;把文化或文明这个主要是精神性的因素同经济、政治、军事等实体性因素割裂开来,把它的作用无限扩大化和绝对化是非常偏颇的。从历史上看,两次世界大战

的爆发显然不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冲突，而是主要西方文明国家之间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夺资源、市场和全球霸权而引起的战争。就现实的国际关系分析，虽然文明冲突时有发生，甚至成为某一地区、某一时期国际关系的热点；但是透过这些“文明的冲突”我们仍可发现深层次的根源仍然是国家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的冲突。面向 21 世纪，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把增强经济和科技实力作为取得竞争优势的根本点，经济问题始终是在国际关系中占据着根本性、决定性的位置，经济关系始终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和决定性力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归根到底决定着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包括哲学、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的全部观念文化和文明状态，也决定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要求、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关系，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始终起基础性的决定作用。然而这一作用的发挥不是机械的、单向的、惟一的，文化的因素和力量也参与其中。文化在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之上，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导向和推动作用，越是在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文化的这一作用越明显。

第五，在世界现存各种不同文化源流中，中华文化是惟一历经从人类文化的源起、生长、发展、壮大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现实中，中华文化在饱经因长期封闭落后而带来的百年屈辱之后，正伴随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崛起而重新引起世人关注。

对此，我们既要头脑清醒，避免因为外国人的夸奖、甚至蓄意抬高而妄自尊大，睥睨一切；更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丧失信心，以至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对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盲目推崇。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回首中国文化的昨天和今天，展望中国文化在下世纪世界各国、各个民族的文化力激烈竞争中的前途命运，我们不由思绪万千。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将基本走完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陆续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各民族为抢占有利于发展的制高点，将展开激烈的科技竞争、经济竞争和人才竞争等，其背后是民族文化素质和国家文化力的竞争。因此，文化问题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

反思中国的文化，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古老的中国文化要走向现代文明，要在与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竞争和交融中立于不败之地，既有丰富的资源和优势，也有因袭的重负及劣根。从人类现代文明已达到的高度审视中国现阶段的文化状况，也令人有喜亦有忧。

历史车轮到了本世纪中叶，中国终于摆脱了自近代史以来任由人欺侮、宰割的屈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起人民共和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一直处于并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定的社会形态，一定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在客观上要求并必然形成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形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例外。由

初级阶段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等决定，这一阶段的文化无疑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有本质的区别；但又由这一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及社会各方面的状况条件等所决定，这一阶段的文化只能是不发达、不成熟、不完备的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相比，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精神、原则实现的范围和程度上有较大的差别，在价值观、道德观等具体内涵和要求上也有明显的差异。能否自觉、科学地认识把握这一历史阶段观念文化的特质内涵、功能作用和发展趋势，在这一阶段的文化建设中处理好与民族传统文化和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关系，对这一阶段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和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至关重要。

中国自 1978 年进入改革开放、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经济建设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经济领域实现了拨乱反正，克服了过去那些脱离实际、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变革一切与之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项配套改革；确定经济建设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重新选择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战略，大胆探索、勇于开拓、积极创新，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在观念文化领域 这 20 年着力纠正过去受教条主义和

“左”倾错误思想干扰影响所存在的“精神万能”和“假、大、空”等错误认识和做法，从实际出发进行积极的探索实践，取得可喜的成效：否定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摆正了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的关系，明确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必须围绕经济建设展开；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倡导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广泛开展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为重点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努力推动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逐步形成；重新强调并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促进了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并确立了这一科学理论在全党、全国的指导地位。这是我国新时期观念文化领域最重大的成果。但就总体而言，这些年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进展不如人意，思想道德文化领域存在种种令人忧虑的问题。如：部分社会成员的理想信念困惑，精神支柱动摇，社会责任和国家观念淡薄，精神空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以及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在社会上大面积滋长蔓延，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领域出现失范现象，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冷漠和功利化，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

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一些格调低级庸俗，甚至黄色淫秽的东西屡禁不止；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和滋长，固然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与我国目前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一社会转型期，原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和道德规范等有些内容已不适应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指导、约束和规范作用；而与新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等，又尚需一段时间才能建立、完善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 因而出现在“空档”社会成员在思想认识和社会行为上难免会出现某种困惑和混乱。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道德和文化领域对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清理批判、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工作，远不如经济领域那样全面、彻底。因而在理论认识 and 思想教育实践中，仍然自觉不自觉地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求来固守 在 worldview、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仍继续简单沿用过去形成的观念和标准，片面地以为思想道德教育和要求的调子越高越好，殊不知脱离了社会发展状况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识水平，就无法打动人心并令人信服，也就难以收到理想的成效。因此，这些年来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在内容和形式方面，还未能完全摆脱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左”的错误思想和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束缚；同时，也存在着对各种腐朽思

想文化侵蚀抵制不力的问题，还未能完全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基础上来，真正与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状况相适应。因此，尽管我们在理论上反复强调必须从实际出发，在主观愿望上企求做到从实际出发，但在观念文化领域里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离人民群众生活实践和思想状况的现象，还相当程度地存在。我们对于文化建设为什么一定要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同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思想道德文化的具体内涵、目标要求和思路对策等等，也还缺乏全面、科学、正确的认识。

比如讲，初级阶段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同新民主主义文化，同社会主义中级、高级阶段以至共产主义的文化的联系、特别是区别在哪里？初级阶段文化建设无疑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创立于 150 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和结论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需要做出新的分析评价、新的丰富发展？问题还在于，过去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凝固化，甚至把许多本来不属于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东西，硬是贴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签，在思想领域造成了混乱。这些‘假冒伪劣’的马克思主义到底还有哪些至今仍在影响、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妨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又比如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兼容并蓄的方针原则。但是，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当中，究竟有哪些是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潮流，是人类共同、共通的精神财富？有哪些通过批判改造、整合创新，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后，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弘扬，为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又有哪些是与现代文明的要求，与社会主义原则精神和我国国情相悖，必须予以剔除、抛弃和抵制？再比如讲，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必须能够适应并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那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能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的现代人文精神、思想观念、经济伦理和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回答、而现实中又尚未能很好回答的重大课题。

由于未能深入研究和正确回答这些问题，造成文化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落后于社会实践，使现实社会中存在着不少“说得通行不通、行得通说不通”的情况，造成意识形态工作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被动状态，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深层次的思想认识和理论问题说不清、道不明，使“左”和右两种错误思潮得以乘虚而入，困扰人们的思想认识，干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造成思想政治工作难以面对和回答现实中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往往只是重复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大话、假话，变成枯燥无味、无的放矢的说教，造成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的建设无法适应现实社会关系和社会生

活 难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 成了空中楼阁、曲高和寡。

综上所述，在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的指导下，深入地系统地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并以此为依据，扎扎实实地推进文化建设，构建起能够统摄人心、凝聚人心、激励人心，引导、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促进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文明全面进步的文化体系，这已成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这一课题研究，还是文化理论研究的内在要求。回顾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文化问题成为世界上各种思想流派、学术派别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且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文化问题的讨论与社会历史的前进相伴随。本世纪以来，我国学术思想界多次发生关于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的论争，都是在追求现代化的背景下、围绕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主题展开，对启迪国人文化的自觉性和推动社会前进起了积极的作用。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文化讨论又一次成为我国思想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追寻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轨迹，我们还会发现：80 年代我国文化讨论和研究的主流是批判和反思，与 20—30 年代和世纪初叶的“五

四”新文化运动颇为相似。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文化讨论研究的主流，逐步转向建构和创新，即认真思考、探索和研究21世纪中国文化的形态、模式、发展战略等问题。文化研究的重点已从批判、反思走向建构、创新。这种转变并非偶然。它反映了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在历史转折关头，社会发展要求人们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但在基本建立起新的体制、机制进入新的运行轨道之后，社会发展就要求人们在思想文化方面“以立为本”了。

本书把初级阶段文化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提出和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概念，运用历史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从历史发展与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角度，考察中国现阶段的观念文化状况，即从考察我国现实的基本国情和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及时代特征入手，从分析研究我国目前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条件、历史任务和社会发 展进程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出发，从我国现阶段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和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关系，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视野，去认识和把握我国现阶段的观念文化，并初步构建了初级阶段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揭示这一文化形态的形成、特质、内涵、功能和发展趋势，以期引起更多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进一步展开深入的探讨研究。